

初创时期的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与美国汉语教学的关系

黎 敏

摘 要：在以“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为起点的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建设初期，虽然冷战使中美处于隔绝状态，但因为专修班教学负责人邓懿与赵元任的师承关系，中美汉语教学产生了一定的联系。美国汉语教学传统对初创时期的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产生了哪些影响，限制后者对前者经验吸收的原因以及后者对前者如何吸收和改造，这些问题可借助相关文献资料从师资、教学模式、课程设置等微观层面入手做具体观察。研究发现，初创时期的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对美国汉语教学有吸收，也有改造，因教学目的不同而使二者的发展趋向产生差异。

关键词：新中国 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 赵元任

1950年，“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成立，开启了新中国高校有组织、有明确教学目标进行对外汉语教学的历程。1952年9月，全国院系调整，“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以下简称“清华专修班”），调整到北京大学，并更名为“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以下简称“北大专修班”）。此时，在师资配备、教学规模，学生人数、来源国范围等方面，北大专修班都比清华专修班时期扩大了。因此，清华专修班时期可视为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的初创时期。关于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初创时期的基础问题，程裕楨认为在1949年之前，“对外国人进行的汉语教学活动都已经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只是既没有人把它当做一门学科加以研究和发展，更没

有人把它当做一项事业予以鼓励和提倡，当然也不会有什么教学的组织机构和组织形式”^①。这意味着清华专修班在组织机构、学科基础上没有可继承的现成基础。当年进入清华专修班从教的教师们的记述，也证实了这个看法。1950年7月，清华专修班具体教学负责人邓懿在写给教育部的报告中说：“这还是一种尝试，没有现成材料可以采取，没有现成道路可以遵循。”^②四十多年后，她在谈到清华专修班时仍说：当时“任何学校都没有现成的对外汉语专业，到哪儿去找现成的师资呢”^③？杜荣、熊毅、钟授都是1950年引入清华专修班任教的教师，他们的回忆中谈到当时没有外国人到中国来留学，教师们只知道外国人跟个别的中国人学点中文^④；清华专修班开课后，面对进步很快的东欧交换生，“教什么，怎么做，没有任何参考资料，只有自己摸索、想办法”^⑤。这些记述表明，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初创时期师资短缺，教师们对这项工作极为陌生。在教学方面，钟授说：“当时并没有成熟的教学经验和模式，主要就是邓懿从赵元任那儿学来的那些。”^⑥在借鉴赵元任的汉语教学模式上邓懿起了桥梁作用。1950年7月，邓懿提交给教育部的报告中也说，关于东欧留学生的汉语教学培训问题要“根据过去的经验及目前的客观条件”而定^⑦，她所说的“过去的经验”应该就是赵元任的汉语教学模式。

赵元任先后两次在哈佛大学教授汉语，1942年至1946年他第二

① 程裕祯：《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发展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页。

② 邓懿：《就东欧留学生的语文训练问题向教育部的报告》，清华大学外国留学生工作办公室编：《紫荆花开》，内部印刷，2011年，第51页。

③ 邓懿：《难忘的岁月》，《北京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中心成立十周年纪念专刊），1994年10月，第2页。

④ 清华大学外国留学生工作办公室：《熊毅访谈录》，清华大学外国留学生工作办公室编：《紫荆花开》，第83页。

⑤ 杜荣：《对外汉语话沧桑》，《北京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中心成立十周年纪念专刊），1994年10月，第5页。

⑥ 崔希亮主编：《对外汉语教学名师访谈录·钟授卷》，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3页。

⑦ 邓懿：《就东欧留学生的语文训练问题向教育部的报告》，清华大学外国留学生工作办公室编：《紫荆花开》，第51页。

次到哈佛大学工作，在该校暑期班和美国陆军专门训练计划部（Army Special Training Program，以下简称ASTP）教授汉语，邓懿担任他的助教，深得赵元任汉语教学方法、理念之真传。邓懿的桥梁作用，使初建时期的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与美国的汉语教学有了一定的关系。本研究意在借助目前接触的文献资料，集中从师资、教学模式与课程设置方面探索初建时期的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与美国汉语教学的关系，借此更细致地了解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基础及其发展取向。

一、1949年以前美国本土及在华汉语教学的状况及特点

为了解清华专修班的教师选拔、培养以及课程设置、教学设计等方面与美国汉语教学之间的关系，有必要先观察1949年以前美国汉语教学的基本状况以及它的传统。

（一）美国汉语教学的初创阶段

对美国汉语教学具有开创意义的人物是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1877年，在中国传教40多年后，卫三畏被美国耶鲁大学聘任为中国语言文学教授，从此开启了美国汉语教学的历程。但卫三畏只是做了关于中国的演讲，并未讲授过汉语课。^①真正意义的汉语教学是两年后清朝九品官员戈鲲化（1838—1882）在哈佛大学正式开始的，这也是美国大学任用汉语母语者教授汉语的开始。据该校1880—1881年度课程表显示，中国官话课贯穿整个学年，每周五天上课，每天教师讲授一小时，学生自学二至三小时。^②虽然学生人数一度达到5人，但大多数时间只有一名学生。这种小班教学，讲练结

① 张西平等编著：《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调查》（上），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第124页。

② 《1880—1881年度哈佛大学课程表》，引自张宏生编著：《戈鲲化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45—346页。

合的教学方法，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戈鲲化去世后，波士顿的一家报纸报道他去世的消息时说，在哈佛大学的学生中，一位从一开始就跟随他学习中文的学生已经具备了跟中国人自由交谈的能力，并且已经基本准备好在中国的商界立足开业了。^①这说明，戈鲲化的口语教学效果良好，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当时哈佛大学开设汉语课程的目的，即满足四类学习者的需要：1. 希望能亲自从第一手资料了解中国的文学、历史和政体的学生；2. 希望为美国领事馆，欧洲政府或中国海关工作，在中国担任一定官方职务的人；3. 希望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不依赖翻译，在北方官话通行的港口做生意的商人；4. 希望在已懂得自己居住地区的民众的方言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些官话知识的传教士。^②这四个目标显示了实用性占主导地位的美国汉语教学特点，为此教学中对提高学习者口语能力非常重视，这也是此后美国汉语教学的一个重要传统。除此之外，这门课也满足了“了解中国的文学、历史和政体”的教学目标，这体现在戈鲲化本身的中国文化符号作用和他所从事的编著工作上。他不仅每次都穿着清朝官服授课，保持中国传统的师道尊严，而且还自编了辅助性教材《华质英文》(*Chinese Verse and Prose*)，其中收录了自己创作的15首诗，既有中文原文，又有英文译文，除了标出平仄以外，还用英文对诗中词句、典故做注解，使学生能够借此了解中国诗歌的独特节奏和韵律，这种教学已经超出了单纯的语言教学而进入了文化教学，其作用正如杜维明所说：“当来自宁波的休宁才子戈鲲化出现在哈佛校园里时，他带来的就不仅是关于中国语言的知识，还有中国文明的精神。”^③这样，戈鲲化所采用的由汉语母语者任教，讲练结合，突出口语，重视文化教学的模式，虽然还不一定是一种自觉意识，但是无疑为此后哈佛大学汉语教学模式的形成开

① Boston Daily Advertiser, February 17th, 1882.

② 《每日图文》(*The Daily Graphic*) 1879年11月3日，引自〔美〕崔颂人：《美国汉语教学的先驱——戈鲲化》，《世界汉语教学》，1994年第3期，第79页。

③ 杜维明：《哈佛：文化的多元与互动》，张宏生编著：《戈鲲化集·序言》，第1页。

了先河。可惜，由于1882年5月美国颁布的种族歧视色彩浓厚的《关于执行有关华人条约诸规定的法律》，严格禁止华人入境，这种模式的建设也因此中断，直到1920年代才有机会被重新拾起。在此期间为数不多的美国本土教师支撑着美国的汉语教学。

（二）“二战”前美国的在华汉语教学

对美国在华汉语教学而言，不能忽视的是1913年在北京正式成立的华北协和语言学校（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①，与其他教会兴办的学校不同的是，它是当时华北地区最大的传教士汉语学校，也是当时国际上最大的汉语培训中心^②，其宗旨是专为教授西人华语。^③它在中国存在的36年中，数以千计的美国人在此成功接受了中文培训，对美国汉语教学的发展意义重大。它的发展速度很快，1919年时，该校拥有87名中国籍教师，20名来自美国和英国的志愿者教师，有174名注册学生，分别来自西方国家的27个传教使团、12家企业和4个使领馆。^④到了1922年时，虽然20名精通汉语的传教士教师人数未变，但中国教师的人数已经达到120名，学生来自21个国家，达到657名，其中美国人474名，英国人129名，其他国家学生54名。^⑤这个规模足以让它的教学对美国本土的汉语教学产生影响。

该校课程分为汉语课程和文化培训两类。汉语课程头两年以必修课的形式将教学重点落在让学生掌握汉语基础知识上；在技能训练方面，该校本着先听说，后读写的顺序进行教学；在教学形式上，它采取讲练结合的形式，即语音、语法等语言知识课由外国教师讲授，中国教师负责口头操练。在中国教师的课上，大量采用了直接法（Direct Method），先由主讲的中国教师在八九个人的大班上演绎课，这类课上

① 在该校发展过程中，其校名有多种变化，因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故本文全以“华北协和语言学校”之名称之。

② 李孝迁：《北京华文学校述论》，《学术研究》，2014年第2期，第109、113页。

③ 章雪楼：《华语学校旬刊·发刊词》，《华语学校旬刊》，第1卷第1期，1922年1月1日。

④ Mrs. W.B.Pettus, “The Modern Study of Chinese Life”, *Fenchow*, 1920(8), pp.1-2.

⑤ *The Missionary Herald*, V.118, 1922, pp.128-129.

杜绝英语，教师通过汉语或身体语言、拟声以及表演等形式，帮助学生理解以英汉对照形式编写的课文内容；其他中国教师在观摩了大班演绎课之后，再对学生做一对一的个别辅导。1921年曾在华北协和语言学校短期任教的孙敬修就经历过这样的教学过程。^①十多年后，1932年来到该校学习的费正清（J. K. Fairbank, 1907—1991）经历了这样的教学过程^②，说明这种教学方法在该校已经成为稳定的教学模式。文化培训以讲座形式每周一至周五上午以中英双语形式进行，主讲人多为学养深厚的研究者，如恒慕义（Hummel, Arthur William, 1884—1975）、博晨光（Lucius Chapin Porter, 1880—1958）等，中国学者冯友兰、梁启超、王国维、顾颉刚、黄侃等也都曾应邀到此讲座。讲座内容涉及中国历史、哲学、宗教、艺术、时事、中西文化比较等，学生可以通过中西学人对各种问题的不同理解，加深对问题的认识。

1914年美国铝业公司创始人马丁·霍尔（Charles Martin Hall）的遗嘱中有一部分“霍尔海外教育基金”被指定用于海外教育，为了得到这笔用于教育的巨额经费，1925年夏，华北协和语言学校并入燕京大学，成为燕京大学中国学系，名称改为燕京华文学校，但仍行使独立的领导权。燕京大学也因此正式成为哈佛大学的合作对象。合并后燕京华文学校的课程包括“汉语教学”和“高级课程”两部分，其中“汉语教学”部分沿袭旧制，直接法仍是其重要的教学方法；“高级课程”则包括中国哲学、文学、历史、美术、宗教等课程。但与燕京大学的合作到1928年年底因故结束，华北协和语言学校校长裴德士（William Bacon Pettus, 1880—1960）开始在美国加州寻找新的合作伙伴。1929年，该校跟加州所有的大学建立了联系并成为加州各大学在中国设立的培养中国学家的专门机构，这不仅使“加州各个大学完善了中国学学科建设”^③，而且该校也成为加州各大学派遣师生来华考察、

① 孙敬修：《我的故事：孙敬修回忆录》，成都：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1989年，第93—94页。

② 费正清：《费正清自传》，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8—49页。

③ 徐书墨：《华文学院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4页。

学习、研究时重要的落脚点。^①此后，由于日本侵华战争和珍珠港事件爆发，华北协和语言学校回迁美国，1942年1月起，正式落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该校部分汉语教师和图书（包括中国古典藏书和教材）也随之迁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②这期间华北协和语言学校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教学上采用互相扶植的办法，双方选出优秀的教师担任教学工作”，教学计划由双方共同制定，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国学直接引进了华北协和语言学校在中国时形成的现代化教学方法。^③

现有资料显示，曾与华北协和语言学校合作的燕京大学也有一门“外人华语”（Foreigner Chinese）课，是专门为燕京大学的外国学生学习中国语言而设置的三学分必修课。中国教师吴天敏曾是这门课的任课教师，她的专业是儿童心理学。1939年12月国语教育研究会成立，吴天敏担任临时主席，从该会的宗旨看，这门课的实用研究任务之一就是如何教外国人国语。^④1940年10月19日《燕京新闻》对燕京大学的这门课程做了介绍。报道说，从1938年开始，吴天敏编了六本教科书，每学期学习一本，前两本是白话，写作与说并重，以后文言文和对子逐渐增多，研究生则采用《孟子》为选修教材，其目的是让学生了解中国文化。到1940年这门课的学生为12人，包括5名研究生和7名本科生，由于学生汉语水平不一，所以被分成三个班进行教学。从这个记录看，当时燕京大学的“外人华语”课已经纳入学历课程，教学目标比较明确，教材内容古文、白话兼顾，也体现了口语、读写并重、重视文化的教学特点。1941年吴天敏还在《教育学报》第6期上发表了《国语读本里各词分写的问题》，分析了汉语教材中词和词连写对外国学习者造成困扰的问题，认为对初学汉语的外国人来说，很难

① 李孝迁：《北京华文学校述论》，《学术研究》，2014年第2期，第112页。

② 根据徐书墨看到的资料显示，第一批运载的5000余册图书到达美国，并成为此后四年落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华北协和语言学校的教学依据；但第二批书籍在运输途中就因战争而沉落太平洋。见徐书墨：《华文学院研究》，第80页。

③ 同上书，第80—81页。

④ 《燕京新闻》，1939年12月2日。

分辨哪个字跟哪个字是一家，为此，她提出词与词之间留出空白的建议。可以看出，吴天敏的建议是针对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困难提出的解决方略，她提出的分词排列的方式，到今天的初级汉语教材中仍是以此方法降低初级汉语难度的一种有效方法。这表明，作为任课教师的吴天敏已经有了将汉语作为外语为外国学生讲授的意识。而重视口语和文化，以汉语母语者任教的特点也在燕京大学的汉语教学中显现。

（三）“二战”开始至1949年以前美国的汉语教学

“二战”爆发后，美军很快意识到外语人才的重要性，因此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大批语言学家转而担任语言教师。^①由于外语教学直接服务于在世界不同战区紧迫的战事需要，美国陆军和海军都成立了专门机构从事外语人才的培训。1941年年初，在全美学术团体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简称ACLS）的倡导下，美国成立了外语速成计划委员会（Intensive Language Program，简称ILP）。1942年夏，美国的18所大学开办了包括汉语在内的27种语言的56个速成外语班，直接法是ILP提倡的主要教学法。1943年4月美国陆军专门训练计划部，即ASTP外国地区及语言研究规划处（Foreign Area and Language Studies Program）成立，“这是美国所有的地区和语言研究机构中规模最大、意义最为重要者”^②，它吸收了ILP的经验，在55所大学27种语言学习中推广使用直接法进行教学，并由语言学家和汉语母语者教师合作授课，语言学家借助英语对语言知识进行解释，汉语母语者教师主要负责语言操练。在语言课程之外，远东的历史和政治制度也是重要的授课内容。这种课程框架和教学模式已经在华北协和语言学校有了十多年的实践经验，“数以千计的美国人在此成功接受了培训”^③，其成效可见，经验成熟，颇具影响力。此时，回迁美国的华北协和语言学校做客伯克利分校，又承担起培训战时美军军官的任务，

① [美] 理查德·T. 汤姆逊：《美国汉语教学综述》，《语言教学与研究》，1980年第4期，第12页。

② 同上书，第14页。

③ 李孝迁：《北京华文学学校述论》，《学术研究》，2014年第2期，第113页。

校长裴德士1945年在总结培训工作时说，华北协和语言学校从1910年起开始培养美国人学习中国文化和语言，“为了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为了赢得我们的未来和利益，就必须了解中国的文化、历史、经济、思想和语言”^①。可以看出他对语言、文化并重的汉语教学理念的坚持之因。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很多大学都采取中美教师合作的模式开展汉语教学。如1942年6月，芝加哥大学受美国陆军委托，开设ASTP课程。此后，芝加哥大学成立了东方研究院，由刚从哈佛大学博士毕业的邓嗣禹担任院长，同时任“中国语言文史特别训练班”班主任，他与美国汉学家顾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1905—1994）合作编写了《中文报刊归纳法》、《中文报刊归纳法翻译与选择练习》，自编口语教材用于语言课教学，同时还邀请一些著名学者为他们的地域研究课做讲座。1943年，耶鲁大学受美国陆军委托，成立远东语文研究院，院长由出生于中国、精通塘栖话的汉学家金守拙（George Kennedy，1901—1960）担任。他与赫德曼（L.M. Hartman）合编《汉语口语》（*Speak Chinese*，1944）等作为耶鲁大学的汉语教材。耶鲁大学中文项目的负责人是生于北京的传教士之子方·亨利（Henry Courtenay Fenn，1894—1978），他曾在华北协和语言学校任教，他的中国教师合作者是193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的房兆楹。房兆楹与语言学家霍凯特（Charles Francis Hockett）合作，在金守拙、赫德曼的《汉语口语》基础上，将此教材扩展为两册汉语口语教材（Charles F. Hockett & Chaoying Fang，*Spoken Chinese*，2 Books），该教材被列入美国《陆军部教育手册》“War Department Education Manual”，于1944—1945年在华盛顿出版。

对邓懿的教学产生直接影响的是赵元任。赵元任对美国汉语教学最大的贡献是把中文教学与当时最前沿的语言学知识和理论结合在一

① Pettus Report, “Archives of the California College in China Foundation, Honnold Library”, Claremont, California.

起。^①这种特点在1922年至1924年赵元任第一次在哈佛大学教汉语时已初露端倪。此时，他不仅表现出对语言科学研究的强烈兴趣，而且已经有不少研究成果刊登在康奈尔大学中国学生创办的《科学》月刊上，如《官话字母音译法》（1921）、《中国谚语字调实验研究法》（1922）、《再论注音字母译音法》（1923）、《语音的物理成素》（1924）等，他的《国语留声片课本》1922年也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说明他有条件将语言学研究成果和现代化的语音设备运用于汉语教学中。赵元任说当时他“或多或少地遵循传统的教学方法，用英文解释课文，然后翻译课文”，教学内容的顺序也按照通常的方式，即口语、书面语、文言文的顺序进行教学。^②而这些“传统的”、“通常的方式”的教学方式正是经过戈鲲化、华北协和语言学校等教学实践逐渐形成的。作为国语标准化的推动者之一，在语音教学上，赵元任已经开始采用地道的北京音作为标准音进行语音教学，所讲授的口语是现代口语。^③在教学内容上，他认为教授文言文对学生今后阅读古籍有益，但要按照先口语，后书面语的顺序教学^④，因为外国人学汉语时，要亲耳听，亲口读^⑤，这恰是听说法最鲜明的教学特点。

1925年6月，清华大学国学院成立，赵元任应邀回国在国学院任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这年的10月30日，他在国学院主任吴宓的陪同下，参观了华北协和语言学校，该校的Lucius Poter教授和Hummel Arthur E.先生接见了他们，跟他们谈了华语教学之法。^⑥因此，赵元任对华北协和语言学校的教学情况应该有所了解。1938年他来到夏威夷大学东方研究所教授汉语，教学内容还是文言文，但是，他认为“要

① 周质平：《美国中文教学史上的赵元任（下）》，《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015年第1期，第88页。

② [美]罗斯玛丽·列文森采访，焦立为译：《赵元任传》，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47—149页。

③ 同上书，第145—149、173页。

④ 同上书，第169页。

⑤ 赵新那、黄培云编：《赵元任年谱》，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19页。

⑥ 吴宓：《吴宓日记》，第三册，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88页。

想学好一种语言，不管它是活的语言还是死的语言”，都应该以活的语言来教^①，而那时活的语言就是现代汉语。

1943年8月，哈佛大学受美国陆军委托开设ASTP汉语课，培训即将赴东亚的美军。按照ILP提倡的由语言学家和汉语母语者教师合作授课的教学模式，哈佛大学的ASTP汉语班也以这个模式展开教学。赵元任就是这里担纲汉语班主讲的语言学家。虽然此时他已经加入美国籍，但是作为一个母语为汉语的学者，他是一位从事了20多年语言学相关研究，在中国进行过多地语言调查，谙熟英语，又有汉语教学经验的语言学家。那时，结构主义语言学风行美国，它所强调的听说法特别适合ASTP这种短期强化速成的外语学习形式，能够迅速满足美军对外语人才的需要。赵元任说，美国陆军请他负责中文班的原因是知道他对教口语有兴趣^②，而这一兴趣最符合ASTP战时实用汉语培训目标。赵元任从“哈佛大学、Redcliffe College和麻省理工学院的中国留学生及家属中，选说北京话的人做助教（informants）”^③，邓懿就是主要助教之一。从注重“说北京话”的人选看，这些助教均为汉语母语者，而且语音标准。在教学中，赵元任成功地将听说法和直接法运用于汉语教学中，他本人负责教材的编写，课文的录音，大班课以英语进行的汉语语法知识讲授；由助教以直接法对9至10人的小班进行语言训练，赵元任指导；此外还要求学生听录音练习听力。^④当时的学生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 1922—2005）就是以这种方式为其日后成为元明史学者打下汉语基础的。^⑤主讲和助教都是汉语母语者，格外重视语音和口语，这让哈佛大学ASTP汉语培训班成效显著。

赵元任说他的汉语教学是跟着一个越来越强调口语的大潮流走，

① [美] 罗斯玛丽·列文森采访，焦立为译：《赵元任传》，第169页。

② 同上书，第181页。

③ 赵新那、黄培云编：《赵元任年谱》，第268页。

④ 同上书，第269页。

⑤ Frederick W. Mote, *China and the Vocation of Hist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2-3.

但他本人并不是这个潮流的发起者。^①事实上从戈鲲化，到华北协和语言学校，再到ASTP汉语教学确实都体现了这一特点。总体看，美国汉语教学更侧重从实际应用目的出发，将汉语交流能力培养作为主要的教学目标。特别是到“二战”时期，应战事需要，这个特点更为显著，借助直接法和听说法的运用，取得了实际成效。在师资上，美国汉语教学往往以学者型的教师与汉语母语者合作实现讲练结合。在教学内容上，现代汉语口语已被引入教学，但同时也接触文言文，课程设置中有以讲座形式进行的文化研究性课程，如“二战”时期开设汉语课的美国各大学大都在语言课程以外，安排了有关中国的系列讲座，其中包括一些中国著名学者的讲座，如哈佛大学有胡适、费孝通的讲座，芝加哥大学有胡适、费孝通、金岳霖的讲座等。这类讲座内容涉及中国历史、政治、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国际关系等。这种课程框架，为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其汉语教学培养的人才不仅满足于现实的目的，还服务于中国研究。

二、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初创时期可吸收的 美国汉语教学资源

1950年，清华专修班成立后，有何种可用的师资，将以何种教学模式展开教学是一个重要问题，作为基础性工作，它对此后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初创时期借鉴美国汉语教学资源的可能性

新中国成立后，冷战使中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处于隔绝状态。因此，直接从外部吸收对外汉语教学资源的可能性很小。在国内，曾经的华北协和语言学校以及燕京大学的教学资源应该是清华专修班最方便汲取的，但从当事人的回忆以及研究者的研究成果看，并未见到

^① [美] 罗斯玛丽·列文森采访，焦立为译：《赵元任传》，第172页。

它们之间有任何承继关系。究其原因以下两点值得特别注意。

第一，从华北协和语言学校内部看，“二战”结束后，1946年10月该校开始着手在北京的复校计划，但是此时解放战争开始。1948年11月，共产党的胜利已成定局，因此该校的125名在校生陆续撤离中国，这年年末该校停止了在华36年的教学活动。在这36年中，人们对它有怎样的认知与它“留下”的资源能否被利用有着很大的关系。从人们对它的认知看，身份不同看法迥异。1925年曾在该校任教的冯友兰说，该校“名义上叫学校，其实是可以长期居住的旅馆。初到北京的外国人，住进去，比住北京饭店便宜，没有自己租房子的麻烦，而且这里还设有学习班，可以学习中文”^①。1932年曾在这里学过汉语的费正清（J. K. Fairbank）说：“这所语言学校就像是一个旅途中的中转站，一个空气阀，在里面的人们可以为未来作好更充分地沉浸到中国文化海洋中去的准备。”^②可见，教师和学生、中国人与外国人的身份使他们对该校感受有很大不同。冯友兰的记述多从生活实用的角度看该校的功能，看不出对该校的敬仰之情；而当时的汉语学习者费正清则把该校视为进一步了解中国的驿站。这说明华北协和语言学校的教学是有成效的，但是在中国的影响力显然不及在美国。

有一个事例可以作为该校在中国的影响有限的佐证。1932年春，借美国学者R. D. 詹姆森（Raymond D. Jameson）受聘于中国教育部到清华大学等高校讲学之际，华北协和语言学校曾邀请他做过三次讲演，同年这三次演讲稿以*Three Lectures on Chinese Folklore*（《中国民俗传承三讲》）之名由华北协和语言学校与加利福尼亚大学以英文联合在华出版。1949年夏，中国民俗学开创者之一的钟敬文偶然发现了这本英文著作，他说：“当时住在北京的民俗学者，如周作人、江绍原、顾颉刚诸位，似乎都没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及此书，我自己在二三十年年代颇留心搜罗这类著作。但是，对于詹教授这部书，却是1949年夏到

①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66页。

② [美]费正清：《费正清自传》，第48页。

北京后，才在东安市场的一家旧书店里发见和购得的。”^①值得注意的是，1926年由华北协和语言学校兼职教员冯友兰出面组织，顾颉刚曾在5月至7月间多次受邀到华北协和语言学校访问并讲座。^②顾颉刚从1916年开始就涉足民俗学的研究，并以《孟姜女故事的转变》（1924）一文奠定了他在中国民俗学史上的重要地位。1928年他在中山大学与钟敬文等人组织了民俗学会，编辑《民俗》周刊，二人有颇多交往，钟敬文对顾颉刚的学术活动与研究也非常关注，但他在回忆与顾颉刚的交往时从未提及顾颉刚在华北协和语言学校讲座之事，这至少说明此事并未引起二人的足够重视。这或许因为詹姆森是在教会兴办的华北协和语言学校讲座，而且他的书也是由教会在华出版社以英文出版，受众有限，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华北协和语言学校及其出版的书籍没有引起当时中国学界的普遍注意，它在中国的影响力主要限于教会以及教民之间。如生活在北京的孙敬修一家都是教民，1921年，他母亲托人在华北协和语言学校给他找了教华语的差事。^③而1952年进入清华专修班任教的赵淑华，从小生长在北京东城区景山附近，非教民，对相距约2公里，位于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的华北协和语言学校则从未耳闻。^④

第二，从燕京大学的情况看，它是民国时期在华的另一种性质的美国对外汉语教育机构的代表，与华北协和语言学校的差别正如冯友兰所说：燕京大学“是美国人为教育中国学生而办的一个学校”，是中国教育界的一部分；华北协和语言学校则是“美国人为在北京的外国人（其中多数是美国人）学习中文而办的一个机构，和中国的教育完全没有关系”。^⑤但无疑，他们都跟美国的汉语教学发展有关。在燕京

① 钟敬文：《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民俗·序言》，〔美〕R. D. 詹姆森：《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民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4—5页。

② 顾颉刚：《顾颉刚书信集》，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33页。

③ 孙敬修：《孙敬修全集》，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88页。

④ 2020年8月，我在访谈赵淑华教授时间及华北协和语言学校及其汉语教学，从事汉语教学40多年的她说那是她第一次听说这个学校。

⑤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66页。

大学，如前所述，1938年吴天敏曾在此为外国学生开设过“外人华语”（“Foreigner Chinese”）课。继吴天敏之后，杜荣在1946年至1950年也曾执教于燕京大学国文系，讲授“Foreigner Chinese”这门课。据她回忆，在她之前，燕京大学的外国学生也要求学习汉语，但只找教会中的一些老先生来教，这些老先生古文很好，但缺乏语言方面的科学知识，也不懂外语。燕京大学的校领导希望改变这种状况，找大学毕业的有专门知识的人来教授。因此，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高名凯就找到刚从燕京大学英语系毕业的杜荣，请她担任这门课的教学。教材则采用法国人编写的汉语课本。杜荣说，最初她教的是十几个驻华美军的子女，但应如何教，她心里没数。教完这批学生以后，只剩下零零散散、程度不同的几个学生，只能以分散教学的形式满足学生的需要。^①从1948年起，邓懿曾有一段不长的时间在燕京大学国文系教“华侨汉语”（“Overseas Chinese”）^②，她解释说，这门课的名称意思是教华侨和外国人中文。^③当时，有廿来位外国学生和华侨学生^④，都具有一定的水平，课程主要侧重阅读理解。^⑤杜荣和邓懿的回忆中都未曾提及吴天敏及其“外人华语”教学，而且，邓懿对该课的名称和理解都与吴天敏不同。这似乎意味着燕京大学“外人华语”这门课在教学的延续性上存在着问题，吴天敏的经验和教学理念并未得到了解和继承。因此，当邓懿、杜荣开始清华专修班教学时，并未从此前燕京大学的汉语教学理念、教学方法以及教材上有所汲取。

综合二者情况，燕京大学的汉语教学只是针对人数不定的外国学生开设的一门课程，未受到足够重视，教师的临时性和教学的不连续

① 杜荣：《对外汉语语沧桑》，《北京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中心成立十周年纪念专刊），1994年，第5页。

② 肖钟：《燕东园内访邓懿》，第61页。

③ 陈莉等：《邓懿先生访谈录》，张英、王海峰主编：《燕园汉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7页。

④ 邓懿：《难忘的岁月》，《北京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中心成立十周年纪念专刊），1994年，第2页。

⑤ 陈莉等：《邓懿先生访谈录》，张英、王海峰主编：《燕园汉声》，第17页。

性都说明了这一点。华北协和语言学校的汉语教学与中国教育体制无关，汉语被作为外语进行教学的目标虽然明确，但是中国人对它的理解和注意都不够。这些都是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初创时期人们难以从二者中汲取资源的重要原因。

鉴于上述情况，清华专修班在教学上能够借鉴的资源应主要来自邓懿带来的哈佛大学ASTP的汉语教学经验，这与邓懿、杜荣、熊毅等新中国第一批对外汉语教师的回忆一致。

（二）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初创时期的教师资源

人才是建立一个学科的关键。对初建时期的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来说，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师资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对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的状态影响重大。

1. 清华专修班的师资选拔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际形势决定了清华专修班师资主要借助国内人才选拔解决。首先，邓懿、杜荣在清华专修班成立时由燕京大学入选，其他教师则未见来自以往与汉语教学有关的外国机构。从此前聘任了众多中国教师的华北协和语言学校的情况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1年11月21日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在发给美国海军部长Fran Knox的函件中说，考虑到不久的将来，美国海军作战部需要接受汉语培训和关于中国习俗方面的讲解，所以他要求美国海军将裴德士以及10名中国籍教师从中国运送到美国，以帮助裴德士在美国重建中国语言文化教学工作。本月24日，Fran Knox复函，称已经责成远东舰队总司令将10名或12名华北协和语言学校的中国籍教师护送至加州。^①当时华北协和语言学校教师流动性较大，比如孙敬修在那里任教一天就作为家庭教师跟着他的学生去了青岛。^②长期在该校执教的中国籍教师并不多。因此，这时到达美国的中国籍教师应当是在该校执

^①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Vol. 7, 1941) (Washington: U.S. G.P.O., 1956), pp.762-764.

^② 孙敬修：《孙敬修全集》，第1卷，第90—91页。

教时间较长，有经验的骨干教师。比如1936年在该校获得硕士学位的康士丹（Samuel Victor Constant）在其学位论文的《前言》中对校长裴德士和中文教师金月波表示感谢，金月波就在这批到达美国的中国籍教师的名单中。^①可见，执教时间长，教学效果好是当时赴美执教的重要条件。而中国也因此失去了一批有经验的职业对外汉语教师。不过，这也为清华专修班按照新中国意识形态和教育思想的需要选拔教师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1950年，清华大学接受教育部任务，按照系级规模成立了清华专修班。班主任周培源聘用邓懿主管专修班的实际教学工作，师资选拔也是在邓懿主持下进行的。

关于教师的资质，1950年，在邓懿呈送给教育部的关于专修班教学情况的报告中写道：“助教必须具有相当的文化水平，操纯正国语，而能用英文达意者，同时须对语言有兴趣，对工作有热情，除非有兴趣对工作感到枯燥无聊，就要影响学生的学习情绪了。”^②这个标准，涵盖了教师的基本素质、教学能力和教学态度，在教学能力上非常强调文化水平、外语能力和纯正的国语语音。从邓懿的师资选拔标准看，赵元任的影响依稀可见。当年赵元任的助教主要来源于操标准国语的留美中国大学生，他们都接受过现代教育而且掌握了英语。可见，受教育水平、国语状况以及外语能力是赵元任选拔助教的标准，这在清华专修班的师资选拔标准上有明显体现。

依据上述标准，1950年邓懿主持了教师招聘考试，考试内容包括汉语语音、语法、一般文化知识和外语。^③首先入选的专修班教师分为两类，即有教学经验的教师和大学新毕业学生或在校生。前者以杜荣为代表，她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精通英语，且有四年对外汉语教

① 李孝迁：《北京华文学校述论》，《学术研究》，2014年第2期，第112—113页。

② 邓懿：《就东欧留学生的语文训练问题向教育部的报告》，清华大学外国留学生工作办公室编：《紫荆花开》，第50页。

③ 肖钟：《燕东园内访邓懿》，《世界汉语教学》（预刊），1987年第1期，第61页。

学经验、积累了不少汉语语法知识的教师。^①后者有两位代表性人物，即聘入专修班承担助教任务的钟稔和冯忆罗。钟稔1949年高中毕业于教会学校，有很好的英语基础，是当年清华大学外文系上海考生中的探花，因基础好而免修国文。入学后，他开始学习俄语。1950年12月1日，大学二年级的钟稔接到由周培源、吴晗签发的委任状，聘任他为专修班的助教。冯忆罗的父亲曾是清华大学共产党地下党支部书记。1950年10月在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学习俄语后，她转入清华大学文学院外语系法语专业。11月，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何东昌找冯忆罗谈话，请她做专修班的俄文翻译和生活助理。12月4日，首先到达的罗马尼亚学生来京的第三天，她正式接受了这个任务。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二人承担此项工作并非出自本意。冯忆罗本意是完成梦寐以求的专业学习^②，钟稔则希望像林语堂、赛珍珠那样，用英文书写问鼎诺贝尔奖。^③他们走入对外汉语师资队伍都是组织上多次做思想工作的结果，说明当时他们并不理解这项工作的性质和意义。这种情况在稍晚经过自愿报名和口试程序进入这个行列的清华大学西语系毕业生熊毅身上也有体现，当时她只是觉得这项工作有意义，自己也有兴趣，但是对工作本身并不理解。^④

仓促间，尽管师资筹备异常困难，但华北协和语言学校的雄厚师资未见进入筹备者的视线。从邓懿、杜荣既是燕京大学毕业生，又曾经在燕京大学执教，钟稔则毕业于教会中学这些情况看，虽然邓懿在多年后仍强调合格的对外汉语教师的“政治条件”^⑤，但专修班没有从华

① 杜荣：《对外汉语沧桑》，《北京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中心成立十周年纪念专刊），1994年10月，第5页。

② 清华大学外国留学生工作办公室：《冯忆罗访谈录》，清华大学外国留学生工作办公室编：《紫荆花开》，第64页。

③ 崔希亮主编：《对外汉语教学名师访谈录·钟稔卷》，第8页。

④ 清华大学外国留学生工作办公室：《熊毅访谈录》，清华大学外国留学生工作办公室编：《紫荆花开》，第82—83页。

⑤ 邓懿：《难忘的岁月》，《北京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中心成立十周年纪念专刊），1994年10月，第2页。

北协和语言学校继承师资主要不是因为政治原因，而是此时它的骨干师资已经离开，剩下的教师本身流动性强，没有以此为业，教学经验堪忧。另外，从教师本人受教育情况看，邓懿认为：“一个合格的对外汉语教师，除了政治条件以外，至少具备中文、外文一定水平，同时要懂中国文化，有正确的普通话发音。”当然他（她）还应该持有大学文凭。^①显然在受过高等教育这一标准上，华北协和语言学校的中文母语教师师资也大多不能满足清华专修班的师资标准。熟悉某种外语、符合政治标准、接受过高等教育、有良好中文基础、国语语音标准，清华专修班这些师资选拔标准也使此后在新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发展起来的对外汉语教学向着专业化、现代化、职业化的方向发展，从而使之与以往的汉语教学形成最显著的差别。

2. 清华专修班的师资培养

清华专修班在很短时间内初步组织起师资队伍，但是这些教师大都没有对外汉语教学基础和经验，因此，通过何种形式的培养能让新手教师迅速成长是清华专修班面临的重要问题。

在师资培养问题上，美国汉语教学至少从华北协和语言学校起就表现出对这个问题的重视。1916年的《中国基督教年鉴》中提到该校拥有一批训练有素的中文教员^②，W. B. Pettus的文中描述了当时的华北协和语言学校实行了现代欧洲的教学方法，摆脱了在旧的教育方法下，学生无法开口进行交流的学习弊端。那些被选拔出来的中国汉语教师们，在开学前要接受两周的培训，并在开学后上一周观摩课，此后还有班主任对其教学进行指导。^③这些记述显示，华北协和语言学校是按照西方的教育标准培养师资，它一反传统上以熟悉古文为标准选择汉语教师的做法，将现代教育的理念作为师资选拔和培养的标准，“努力

① 邓懿：《难忘的岁月》，《北京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中心成立十周年纪念专刊），1994年10月，第2页。

② W. B. Pettus, “The 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6*, p.431.

③ Mrs. W. B. Pettus, “The Modern Study of Chinese Life”, *Fenchow*, 1920(8), pp.1-2.

使学校适应新的时代”^①。这一特点在“二战”时期服务于美军战时需要的哈佛大学ASTP汉语班中也得到体现。由于这个班是应战事需要而生，组织时间紧急，助教们大都是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中国研究生^②，此前并无对外汉语教学经验，所以赵元任对助教们的培训方式是边干边学。牟复礼说赵元任指导和训练中国老师上小班操练课和参与课文录音。^③邓懿正是在这种边干边学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

与ASTP相似的是，清华专修班也是在时间紧急的情况下投入教学的，在邓懿的指导下以老带新、边干边学是新教师们掌握业务的主要方式。作为一种教师培养的制度，这种方式在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中延续多年。1953年进入北大专修班作教师的李景蕙，最初是做邓懿的助教。据她回忆邓懿对新教师的要求非常严格，新教师们被要求学习掌握教学特点、性质和任务，要把汉语作为外语来教，深入了解并熟练掌握教学大纲所规定的培养目标，从教学实际出发，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为了让新教师尽快适应并熟悉教学，保证教学质量，邓懿要求新教师必须跟班听她的课，这样在他们自己上小班练习课时才能保证讲练之间的连续性。邓懿还经常轮流听几个小班的练习课，检查助教们的课是否体现了本课程的特点和要求，就连每天的课外辅导也受到邓懿的关注，她时时检查辅导效果。新教师批改的学生作业是邓懿检查的重点，她找出其中的疏漏和错误，深究其原因，不允许有丝毫马虎。^④

为了督促新手教师积极精进业务，清华专修班还以业务考核的形式对之进行专业能力检测。如1952年春，邓懿组织全体教师进行了“教员业务测验”，主要测验教师拼音、标点使用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① [美]费正清：《费正清自传》，第47页。

② 杨联陞：《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2—27页。

③ Frederick W. Mote, *China and the Vocation of Hist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p. 2-3.

④ 崔希亮主编：《对外汉语教学名师访谈录·李景蕙卷》，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3—26、154—155页。

根据测验结果，提出每位教师的优缺点，督促教师提高业务水平。^①这种同行互学，专业测评的方式使专修班的新手教师在业务水平上得到迅速而有效的提升。

虽然在教师培养方式上清华专修班与ASTP汉语班具有一致性，但清华专修班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其师资培养是在新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建设中进行的，在师资建设和管理机制上体现了制度化特点。如它的班主任由教育部直接任命，骨干教师邓懿的薪金也直接由教育部专款拨发。^②在教育部的指导和清华大学的直接管理下，1952年2月，清华专修班已经搭建起由1名班主任、2名讲师、4名助教以及5名助理组成的师资框架。体制化的建设，为教师队伍的稳定以及教学水平的提高提供了保障。这是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规模能够不断扩大、质量不断提高的重要人才条件。

（三）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初创时期的教学模式与课程设置资源

对东欧交换生汉语教学的一个直接目标是为了解决新中国与东欧五国交往中语言人才奇缺的问题，其紧迫性与ASTP的教学需要相似。1950年7月，邓懿在《东欧留学生的语文训练问题向教育部的报告》中谈到清华专修班的教学目标是“在一年内掌握普通的中国语文解决一般生活问题”。^③为此，根据在哈佛大学ASTP教学中获得的经验，她对清华专修班的教学进行了初步设计并在此后的教学中实施。

1. 教学模式

1951年年初，清华专修班正式开课。在邓懿的指导下，它采用的教学模式沿袭了赵元任在哈佛大学ASTP汉语班执教时所采用的模式，即学生的语言课分为大班讲课和小班操练两种。这种模式经过华北协

① 清华大学外国留学生工作办公室：《教学组织》，清华大学外国留学生工作办公室编：《紫荆花开》，第25页。

② 清华大学文书组：《清华大学1950年新聘教师名单》（1950年10月4日），清华大学档案，人事全宗号：2，目录号：校办5，案卷号：5007。

③ 邓懿：《邓懿就东欧留学生的语文训练问题向教育部的报告》，清华大学外国留学生工作办公室编：《紫荆花开》，第53页。

和语言学校、ASTP等机构的教学实践检验，颇具实效，特别适合短期强化语言培训，在培养学生目的语的听说能力上尤为有效。在授课教师的分工上，ASTP当时的学生牟复礼说，他们“每天上午第一个小时听赵教授讲解语音和语法，接下来两小时则由他指导和训练出来的中国老师进行小班操练”，“我们每天也花两个小时在语言实习室里，听由赵教授、他的家人和小班操练老师所共同录制的课文和对话的录音”。^①依此，清华专修班的大班课由当时该班职称最高的讲师邓懿、王还讲授约两小时，涉及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等；小班练习课则由助教针对大班课的内容进行练习，讲师指导。沿袭了赵元任重视使用录音帮助学生纠正发音错误的传统，邓懿非常重视这种近代语言教学中已大量使用的语音教学方法。^②由于她的重视，首批东欧交换生第一学期听录音的时间一度达到每周6小时，后因学生倦怠，从第二学期起改为每月为学生录音两次，教师纠正其发音问题。^③在学时安排上，最初两个星期是强化声母、韵母、声调的发音练习；此后每周六小时练习口语，六小时听录音。美国汉语教学中大量采用的听说法在清华专修班的教学中也得到充分运用，这为不少东欧交换生打下了良好的语音基础。对学习者的听说技能的重视，既与美国汉语教学的实用传统有关，也符合清华专修班对东欧交换生培养的实用目标要求，所以在实用性方面，初创时期的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吸收了美国汉语教学的经验。

由于教学背景、对象、目标等方面的差异，清华专修班对赵元任的ASTP汉语教学模式做了必要的改造。在教学方法上，ASTP汉语班的教师均为英语熟练的汉语母语者，学生均为英语背景，赵元任用英

① Frederick W. Mote, *China and the Vocation of Hist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p.2-3.

② 邓懿：《邓懿就东欧留学生的语文训练问题向教育部的报告》，清华大学外国留学生工作办公室编：《紫荆花开》，第51页。

③ 邓懿：《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工作总结》（1952年7月），北京语言大学档案馆，手写本，由北京语言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何玲转录。

语讲解语法知识，听说法和直接法在其教学中大量使用。清华专修班的教师均为汉语母语者，他们大都掌握了英语或俄语。但专修班的教学对象来自五个国家，不仅彼此语言不同，而且很多人不会英语，唯一能勉强借助的媒介语是俄语。因此，第一学期初大班讲解时需借助会俄语的教学助理翻译。为了应对这一不利情况，专修班对教学方法做出调整，如邓懿的大班讲授课中，她先用英语讲解语言结构的语法意义，但在对语法结构本身的讲解过程中，则结合演示使用汉语启发学生^①，约两个月后便有意识逐渐摆脱翻译法。在汉字教学方面，赵元任采取“先语后文”的教学法，即在第二学期（或至少在第一学期末）才教汉字^②，而邓懿认为：“汉文的方块字对西籍学生是非常新奇的”，“必须及早介绍给学生”，她强调汉字教学的意义在于：“只有把看方块字写方块字变成学生的习惯之后，他们才能对我国文化、我国生活觉得亲切。”^③她对汉字教学意义的理解已经超越教学本身而直指人才培养的最终目的，即汉语学习者对中国文化的认同。这使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在一个较高的认识基点上展开。

2. 课程设置

课程设置与教学目标关联密切。ASTP汉语班的教学是美国培养服务于对外战事所需的美国的语言人才；而专修班是中国培养未来与中国进行外交交流的国外的语言人才，因此二者的教学目标有着本质的不同。这种差异在清华专修班教学目标上的突出表现就是，其课程设置不仅重视满足实际语言运用的能力目标，更重视满足“通过中国语文的学习，使对中国政治文化及其他方面获得初步认识，以加强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与中国人民间在文化上，思想上及情意上的交流”的

① 崔希亮主编：《对外汉语教学名师访谈录·李景蕙卷》，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0—21页。

② 杨联陞：《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集》，第130页。

③ 邓懿：《邓懿就东欧留学生的语文训练问题向教育部的报告》，清华大学外国留学生工作办公室编：《紫荆花开》，第51页。

情感目标。^①如前所述，美国汉语教学有语言、文化并重的传统，课程设置包括语言和文化两类课程。文化类课程是为学习者了解中国而设置，多以邀请中外著名学者讲座的形式进行，内容涉及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清华专修班的课程设置也包括这两类课程，但根据其教学目标的需要，在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上都与美国的汉语教学有所不同。

在语言类课程方面，专修班的授课内容与当时社会政治生活密切结合。因为没有现成教材，教师们现编现教，而“语文教学也贯穿着政治思想”，“要有鲜明的阶级立场”，“要充分反映出今天新中国的新的一切”是他们对教材编写原则的理解。^②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课文的政治性是内容选择的一个重点。如首批交换生第一学期的教材中，前25课为偏重日常生活的口语对话体，为了弥补政治性不足的问题，在学期结束前增加了三课配有俄英文翻译的政治内容的课文；第二学期课文的政治性更强，涉及“七一”、“八一”、平型关、长征等革命斗争内容以及新中国的劳动模范，并以毛泽东在第三届政协会议上的开幕词为学习原著的开始；第三学期则将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等三篇文章纳入课文，并以鲁迅的《故乡》、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等名家名篇作为文艺文收入教材。^③从课文选篇看，现代汉语是全部课文的语言载体，加上口语以现代汉语为教学内容，清华专修班的语言教学全部集中于现代汉语的学习和借助课文对中国当代生活的了解。其实际应用的目的比兼顾中国研究的美国汉语教学更为鲜明。当然，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清华专修班为汉语预科教学，学生的专业学习在两年汉语学习之后进入中国不同大学入系展开。

与之相应，专修班文化类课程以专题报告的形式进行。例如，

① 《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两年教学计划草案（修正稿）》（1951年6月），清华大学档案，目录号：校办1，案卷号：520011。

② 邓懿：《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工作总结》（1952年7月），北京语言大学档案馆，北京语言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何玲转录。

③ 同上。

1952年6月起，专修班每周举行两次专题报告，前后七讲，讲座人及讲座题目如下表：

表1 1952年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专题报告^①

序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	王还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2	王还	中国的新学制
3	朱德熙	中国的文字
4	孙毓棠	上海电力公司——美国对华的经济侵略
5	周一良	中朝关系
6	李广田	鲁迅和他的《故乡》
7	丁则良	李提摩太

从“表1”看，报告人均为当时清华大学教师，报告内容涉及中国概况、政治、经济、历史、教育和文学。此外，专修班还组织东欧留学生们参观工厂和农村、到中国各地游览、邀请志愿军英模做报告等活动。所有这些课程、活动内容的设计都指向对中国的了解而非对中国的研究，这一点与清华专修班教学的情感目标是一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课程内容中，政治内容突出的特点是当时中国高等教育建设的重要特点。1949年8月10日，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决定，“各大学院校全校共同必修课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包括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包括中国近代革命运动简史）两种”，各课每周皆三小时，一学期学完。^②这说明，专修班课程内容的设置既与新中国高等教育课程建设要求一致，又呼应了使东欧

① 本表根据邓懿《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工作总结》（1952年7月）制作。邓懿：《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工作总结》（1952年7月），北京语言大学档案馆，北京语言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何玲转录。

② 《华北高教学会常委会第三次会议讨论改革大学课程 订定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新民主主义论为各大学必修课》，《人民日报》，1949年8月12日。

交换生“对中国政治文化及其他方面获得初步认识”这个教学目标。这也是使清华专修班的课程设置与美国汉语教学课程设置形式相似，但内容截然不同的重要原因。

结 论

在将汉语作为外语，以现代语言学理论指导下进行教学方面，美国早于中国，也积累了相对丰富的经验。因赵元任与邓懿的师徒关系，又使初创时期的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与美国的汉语教学产生了微妙的关联，但复杂的历史原因限制了对美国汉语教学资源的吸收。即使如此，在教学理念、教学模式、师资培养、课程设置形式等方面，清华专修班仍以不同形式借鉴了美国汉语教学的经验；但在师资选拔、课程内容等方面，它则做出符合新中国高等教育建设以及东欧留学生培养目标需要的独立建设。这双重因素使新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从初创时期起，就不同于以往中国历史上的汉语教学，它以现代语言学理论为基础，以现代汉语为语言教学内容，以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为学习者认识中国的基础，为新中国对外现代汉语教学开辟了新路。也因这样的差别，中美汉语教学有了不同的发展路径。美国汉语教学在重视语言能力实用性的同时，重视以中国研究讲座引导学习者对中国问题的思考，很大意义上支撑了美国中国学的研究。以清华专修班为起点的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侧重学习者对汉语技能的培养和对中国的情感目标建设，因此，其教学材料不是追求研究性，而是追求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形式展示中国的社会生活。